

心灵的创伤要靠时光岁月的理疗，更待亲情的抚慰。天灾如飓风扫过大地，事实上，尘埃落定时，人们往往发现他们在世上唯一的财产，就是亲情了。在本书中，这种亲情不仅体现为家族血脉间的相互支撑和延续，更放大并深化为不分国别、地区、种族和文化背景的无疆大爱。现场争分夺秒的生命救助、情暖人心的心理疏导；异国他乡纷至沓来的救援志愿者和四面八方汇集灾区的急救物资；灾后兄弟省、市倾力相助的对口援建……在大地震冲击波后，物质重建、文化重兴、社会重构，灾后康复之路上的每一个足印都是亲情与大爱的写真，饱含亲情的真爱之花绽放出人性温暖的光辉。

《汶川大地震冲击波》还带给我们什么呢？是对巨灾研究的新认识，是从世纪之殇中获得的惨痛经验教训和减灾启示。

汶川所在的川西地区历来是地震多发的地带，地震非常频繁，总的数量和东部地区发生地震的比例大概为9：1。整个西部地区是南北向山脉的集中区，能够划分出7个地震活跃带，一直是科学家们最为关注的地带，也是中国地震局重点观测的地区。

2008年汶川地震后，在温家宝总理的指示下，组建了30多人参加的“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我作为委员会的负责人，组织、开展了相关的一系列工作。除了对“5.12”震灾之后各项具体工作的处理和安排，更有对未来防震减灾问题的考虑和规划。其中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对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州和济南六大城市进行考察。近些年来，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和经济的发展，高层建筑大量涌现。一些城市以摩天大楼来展现城市形象和经济实力，实则城市发展带来一系列隐患。不言而喻，建筑物越高，抗震能力越差，发生地震造成的伤亡和损失就越大，对震后的快速抢险救援也造成极大困难。高层建筑物间的活动空间相对减少，致使社区避险能力也相对降低。地震灾害成为城市高层建筑的一大安全隐患。试想，如果像汶川这样的大地震发生在高楼林立、人口高度密集的大城市，尤其是国际化的大都市，那么有效的救援几乎无法实施，损失将难以估量。所以，汶川大地震让我们在警醒要以坚固的建筑物抵御地震的同时，也要特别重视对城市建设与发展的科学规划。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城市，一般采取比较理智的态度：尽量减少摩天大楼的建设，而一些发展中国家则恰恰相反。出于防灾减灾、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需要，在当今城市化建设的进程中，要特别警惕盲目建造高楼的倾向。新建高层建筑，必须在规划之初就要进行科学论证，应该用科学发展观指导城



人，想见到更多的单位同事。黑暗无边，地在摇晃，一整夜都是垮岩的声音。他走了一圈又一圈，始终不见他们的踪影。

天终于亮了。在县领导的统一部署下，他们有序地撤离到任家坪。

一到任家坪，他将妻子托付给李军，转身就往回赶。

他要再回县城，去找幸存的同事。

临别，雨好大。妻子见他从昨天到现在，只穿着一件薄背心，便将别人给她披在身上的皮夹克脱下，要他穿上，只叮嘱了一句，注意安全。

再回县城，一路跋涉，来到县人大门口。原来左转一条街就是法院的办公楼，现在这里已成为一座高达数十米的废墟山。翻过废墟，摸索到县医院门前，再也无法前行了。法院没了，街上的活人没了。大雨如注，苍天在哭！眼睛里，尽是一些遇难者的遗体、残垣、断壁……

重返北川：他与同事紧紧拥抱

再回任家坪，听说已经成立了县抗震救灾指挥部。到指挥部报到时得知，法院有11位同事活着。他在心里祈求更多的同事都能活着，并向县抗震救灾指挥部报告：北川法院还在，请给我们分配任务。

他们接受的任务便是分发食品和水，既要保证大家有吃有喝，又不能让人囤积食物。分发食物的间隙，桂勇总要四处去走，寻找同事和亲人。为了避免造成哄抢，白天，他们不让任何人接近帐篷。当晚9点多钟，指挥部的工作人员来到帐篷，发给每人一只热鸡蛋，说是一位个体老板送来的，拉了整整一车。握着热鸡蛋，桂勇的心里百感交集。从地震到现在，几十个小时过去，也分到了方便面，可他吃不下，仅喝了一点矿泉水，竟毫无饥饿感。此时他感到自己握着的，不光是一只鸡蛋，更是整个社会对灾区民众的关爱。

14日凌晨5点多，桂勇又接到了新任务：为海南地震搜救队带路，前往县城救援被埋人员。

来到县城，搜救队兵分两路，一路在县政府大楼前施救，一路前往曲山小学。这是一支专业的搜救队伍，搜救效率极高。在曲山小学垮塌现场，桂勇参与救援，并亲眼见证他们救出4个被埋的孩子。

再回任家坪，已是傍晚时分。这时的手机已能收到短信息。都是外地亲朋好友的担心和问候。他翻着手机，一个个查看号码，想在上面发现更多活着的同事和亲人的信息，可是，一个也没有。

他再也坐不住了，安排好分发食物工作，向指挥部说明情况，开着车往绵阳赶去。



了，幸好他的车刚好停在一块巨岩下，所以人车没受到一点损失，可当时他被吓得魂飞天外，打开车门往外逃时，连驾照、行驶证、身份证都忘了拿。今天知道刘明武来这里，请他顺便到他当时停车的地方去，帮他把几样东西取回来。

老刘向妻子交代了几句，便往下游走去。我和朱富会继续向着大坝前行。

下午2点25分，我终于来到了大坝上，我的相机快门，开始咔嚓、咔嚓地唱起我永远听不够的歌声……

专家预计洪水应该在6月3日前后自然流出泄洪渠，现在已经5日了，泄洪渠里还没一滴洪水流出。

我沿着没有水的泄洪渠道向上游走去，看到泄洪渠河床高度标杆上写的是742米，而堰塞湖水平面的高度根本就还没涨到这个高度，洪水当然流不出来。

在泄洪渠道与堰塞湖进水口连接的地方，堰塞湖水的水平面刚好和泄洪渠道的水平面持平。三亿立方米的堰塞湖水看上去很是平静，以肉眼几乎觉察不出的速度往泄洪渠道里慢慢侵蚀过来。

2点59分，我踏在堰塞湖浸进泄洪渠道二十多米处的浅浅的水里，叫朱富会用相机给我拍了一张留影，并和外地的友人通话，说自己正踩在堰塞湖水流进泄洪渠的水头上，拍了一张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全世界最牛的一张纪念照。

3点钟刚过，一架绿色的军用直升机，降临堰塞湖右岸最高的坝顶。几个穿迷彩服的军人陪着一个穿白短袖的人走下飞机，我用350mm的长焦镜头对准他们拉近来一看，才看清楚是温家宝总理，不由得心中涌起暖流：已年逾七旬的温总理又一次来到唐家山堰塞湖，为泄洪的事操心劳累……

李贫：1989年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摄影记者专业，1992年中国高级摄影班进修结业，1998年美国纽约大学摄影艺术学院进修结业。有多部摄影作品在国家级摄影大赛上获奖。2008年出版的反映北川的人文、风光、民俗风光和“5·12”大地震现场状况的纪实摄影画册《撕裂的天堂》引起巨大反响。现在绵阳市残联《暖流》杂志社做记者、编辑工作。

救命的稻草！

中午11点左右，一架军用直升飞机盘旋在县城的上空，马健心里更是觉得：青川，终于有希望了！

5月13日晚上9点多钟，40多岁，圆盘脸，一身酸臭的党青，匆匆走进了县委大院，这位《天府早报》的副总编，是外来记者第一人！

第三天：希望飞升

5月14日，新华社陕西分社的记者陶明，从陕西宁强徒步边走边摄影，下午从码头刚下船，巧遇李浩生书记。就在路边，陶明通过随身携带的海事电话，第一时间及时、准确地向北京报告了青川的灾情惨状和面临的困难。李浩生书记嘴唇干裂浸血，陶明强行把仅有的2瓶矿泉水塞给李浩生书记。黄昏，陶明走进县委大院，当晚他写了1 000多字的灾情报道，直接把稿子传去新华社，新华社马上传给都江堰前线指挥部。

军用直升飞机和进入青川的各路记者们第一时间报道了青川严重的灾情，终于使青川灾难深重的灾情通过各种渠道传到前线指挥部，送到了温家宝总理手上。

5月15日，青川县25万无家可归、陷在绝望边缘的人们，迎来了心系灾区人民的温家宝总理。总理让灾难中的人们重拾信心，挺起坚强的脊梁。

马健更暗下决心，拼命也要抓好战地新闻中心，拼命也要把青川宣传出去！



大地震发生当晚，青川县委召开抢险救灾紧急会议



记忆都是温馨的。一两个月之后，大家庭就解散了。所以，记录这一段生活非常有价值，非常有意义。据称在这次抗震救灾中，我的这一选题在全国同行中独树一帜，被人称为“思路新颖，视角独特，既有人情味儿，又有史料价值”。这让我感到欣慰。

在帐篷前，孩子们与来自国外的志愿者一起做着跳绳、传气球等简单的游戏。当看到游戏中的孩子们笑容依旧是那样的灿烂天真，我不停地按动快门。那一张张笑脸以及爽朗的笑声也感染着受灾的群众和参加抗震救灾的志愿者们，让人们看到了希望，走出灾难的阴影。那笑声，似乎也在告诉人们，只要勇敢地去面对，再大的灾害我们也能战胜。

一天，重庆的餐饮企业运来了粮食、蔬菜和炊具，开始搭灶做饭。灾民们无论男女老少，全自发站成两排，形成两道人链，把粮食从卡车上卸下来。据说那是一批够7 000灾民吃一个月的粮食。看着已经驼了背的老人，弯着腰在人链中吃力地搬运着，我感觉到一种力量，一种中华民族空前团结的力量，一种在自然灾害面前心手相连的力量。

当我看到儿女在外地打工的老两口，连一间遮风挡雨的棚子都没有时，我便找到镇里物资调配站，要来帐篷，和志愿者们一起为两位老人“搭”建了一个家。老人感动得逢人便说：“唐山人好！”

一些羌族老乡把我这个来自唐山的记者当成朋友。几位小朋友经常拉着我的手问这问那，依依不舍。一天，一位老大妈拿出招待贵客的腊肉，切了一块非让我吃不可，这不仅是一点食物，也是一片真情，但我觉得不能随便吃灾民的东西，于是便托辞说：“我是回民。”对方才不再劝我。

5月17日下午，我去绵阳传照片，并与北京的两位媒体朋友相会，准备返回北川。在半路上朋友得到消息，称北川有紧急情况，可能有洪水险情。经与有关部门核实后，朋友劝我马上一块儿赶到成都，以免有危险。可是我想，我是来救灾的，不能先退，便果断地说：“北川还有我的同事，我必须回去！无论如何我们都应该在一起！”于是，我拦车直奔北川。路上急匆匆的人们和部队的战士们情绪十分紧张，滚滚烟尘在震后布满一道道裂缝的路上扬起。在离北川中学很远的地方，车不能行进了，我当即下来背着摄影包疾步向前，一边走一边给北川的志愿者负责人打电话，告诉他这一急切的消息，并嘱咐：“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我们应做出预案，应对一切可能出现的险情。”路上，一位素不相识的路人，见我还往里走就劝告我：“这个时候咋还往里走？不要命了？”我说：“那儿还有我的同事！”经过一个多小时徒步行，我终于在5点多赶到北川。此时，我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

6月9日那一天，有两名男子自管制区内向外走来，当他们看到执勤民警时，动作稍显犹豫，这一细小举动早已被执勤民警刁彦杰看在眼里，立刻对这两个人进行了详细的询问，并依法对他们随身所带物品进行检查。结果，从他们内衣里、鞋子里查获现金6 000余元，还有他们包在脏旧衣物里的玉器、纪念币、金银饰品等赃物46件。原来，这正是两名趁火打劫的不法分子。

6月12日晚上12点多，特勤中队民警在检查两名出城男子携带的物品时，发现他们两个人带有3部手机，这一现象引起了民警的怀疑。当进一步询问他们这3部手机的号码以供核实时，他们却答不上来。在进一步的搜查中，从他们身上缴获现金900元、象牙雕刻、玉器、金银首饰等赃物。经仔细审查，原来这两名犯罪嫌疑人借北川县城内无人之际，从附近山路潜入，想趁机大肆盗窃作案，可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执勤特警火眼金睛，让他们落入恢恢法网。

工作当中，特警队员遇到最多的是成群结队的人员要求进入管制区。其中，有想进行采访的中外记者，有热心的志愿者，也有寻找家人、祭奠亲人、回家搬运财物的受灾群众。面对他们，特警队员既要严格执行抗震救灾指挥部的规定：没有准许证，任何人不得入内；又要带着对灾区群众的一份爱心，耐心详细地说明原因，讲清道理。但是仍然有许多群众不能理解，个别群众言辞激烈、情绪失控、粗暴谩骂，甚至强行冲卡。每每这种情况，特警队员都不急不躁，苦口婆心地劝导，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并且尽可能地去满足灾区群众的合理要求。

一次，济南特警队员王毅在执勤点上拦住了一对在外地打工的羌族姐妹，她们千里迢迢赶回来祭奠遇难亲人，哭泣着指着离哨卡几百米远的一处废墟哀求：“那儿就是我们的家。我们家七口人都被活活埋在下面了。求求你们，放我们过去，我们就烧几炷香，磕几个头。”

听了姐妹俩的哭诉，王毅犹豫了，在满足群众要求和抗震救灾的大局之间权衡着。为了更多人的生命安全，王毅只能诚恳地对姐妹俩说：“你们失去亲人的心情，我们很理解，也很难过。但我还是不能放你们过去，请你们原谅和理解！”

听到这话以后，姐妹俩双双哭倒在地。王毅和战友们眼里浸满了泪水。这时，一个队员走到管制区外不远处的一片能俯瞰全城的废墟上，他弯下腰，开始一块一块搬动脚下的砖石瓦砾，一个又一个民警相继上来，他们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清理着那片废墟。他们没有工具，有的只是双手，手套磨破了，手掌磨出了血痕，指甲撕裂了，但是没有人停下来，一



援刻不容缓，救出一个遇险者后，便立即又投入到下一步的营救工作中。

当救援队在新建小学的营救接近尾声时，王志秋处长沙哑着嗓音布置：“让搜索犬在此确认是否还有被困幸存者！”经搜索犬再次搜索，没有发现新的被困者。接到上级命令，我们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又赶赴下一营救地点。

14日，我们到达绵竹汉旺镇。东风汽轮厂中学高中部四层高的教学楼，在大地狂暴的颠簸中，化为一片废墟。应该讲，对于地震废墟，救援队员再熟悉不过。虽然早有心理准备，可眼前的一幕还是让救援队员感到格外惊心动魄：楼房主体大部分坍塌，只剩下两侧倾斜的墙体及在墙体上悬挂着的摇摇欲坠的楼板。望着扭曲的横梁，面对随时都有可能发生二次倒塌的墙体，队员们临然不惧，马上商讨制定科学施救方案，力争尽快与废墟下的受困者零距离接触。

在楼体正面的废墟下传来一名男孩的呼救声：“救我，快点救我！”救援工作当即展开。

经勘察，这名男孩身体的2/3被倒塌的砖墙埋压，1/3露在外边，而压在受困者身上的砖墙上又被一钢筋混凝土的横梁及楼板死死压埋，在受困者的头顶上部，是一根与圈梁根部几根钢筋连接的横梁。

很明显，把这名受困者直接从废墟中救出是行不通的。这时，只听男孩用虚弱的声音问：“叔叔，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回答：“我们是从北京来的，是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听到我们的身份，男孩那张沾满灰尘的脸微微一笑。此时，无须用语言来表达我们就明白，男孩的微笑是在与我们进行心与心的交流，因为他看见了幸存的希望。随后他又问：

“叔叔，我能出去吗？”“能。”队员们的口气很坚决。在聊天中得知，这名男孩叫江涛，是东汽中学高二（二）班学生。队员们边和江涛聊天，边把他头顶上与圈梁连接的横梁做好支撑，主要是为了防止横梁的坠落。如果不进行支撑，则会对救援队员和江涛的安全造成严重的威胁。

当对横梁的支撑工作快要完成时，听到江涛哆哆嗦嗦的声音：“叔叔，我冷，我好冷！”我着急地对另一营救队员喊道：“快去找被子！”可当时救援现场哪儿有被子？！多亏队友在另一现场进行救援作业的大型机械上找到一块大的海绵，便拿来盖在江涛露在外边的身体上。过了一段时间，我去握江涛的手，感觉到他身体温度比我的还热，心想也许是海绵起到了御寒作用？可又一想，不对，别不是发烧了！“医生，医生，快点过来！”我赶忙大声呼唤起来。救援队的医生闻声呼呼地喘着粗气跑到江涛面前，马上用温度计测量江涛的体温。





与此同时，我们在继续营救，先用一块厚的木板遮挡在江涛露在外边的身体上，又及时清理压在江涛身上的瓦砾。营救空间只能容纳两名营救人员，还不能大幅度操作，队员们边清理边相互提醒着，轻点，轻点……可在清理时，忽然一块砖滑落下来，当时可把王志秋处长吓了一跳，即刻叫停。我们看了看江涛，担心地问：“砸着你了吗？”“叔叔，没有，因为我身体上方有你们预先给我遮挡的木板。”王志秋处长一颗悬挂的心这才落了地，正是我们预先放置在江涛身体上方的木板保护了他。

这时医生拿来药物、液体，及时输进江涛的血管……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压在江涛身上的瓦砾越来越少，可最主要的还是压住江涛身体的砖块。横梁压埋的砖块必须及时凿破，但机动凿岩机是不能使用的，因为用机动凿岩机凿破砖块时会发出很大的声响，还会排放出烟尘，这对江涛会造成伤害，给困在废墟中的江涛的心灵带来创伤。我们只能用手动破拆组合工具进行破拆，对于砖墙我们只能轻轻地一块块地破拆，不可能大面积凿破，不能给江涛带来任何的二次伤害。面对废墟，我们是有力使不出，废墟的营救空间只能容纳一个人破拆，王志秋处长当即安排：一个队员实施破拆工作，让另一位队员在旁边待命，当前一个队员干累了时，另一个队员便接过工具继续工作……

随着时间的流逝，身上压着砖块的江涛突然说：“叔叔，我的腿能动了！”队员们急忙说：“别动，千万别动！”因为江涛的腿是被大型砖块所压埋，并且已经快两天了。队员们急忙找来止血带，绑系在江涛的右腿上，因为害怕他血液许久没有循环的右腿，血液突然恢复循环会对江涛本人的生命造成威胁。日本阪神大地震救援中就有一个实例，一名受困者被楼板压住右腿，当被营救人员救出后，因为没有及时对他进行绑系处理，这位获救的幸存者，送到医院后却不治身亡，为什么？就是因为他被楼板久压的右腿，因为血液没有循环，等被救出时，血液瞬间循环，回流，挤压到心脏而造成伤者死亡。我们不能将历史悲剧重演，必须科学施救。终于，救援队员们把江涛安全地从废墟下营救出来。

当一切检查完毕后，担架也迅速准备好了。当我们把江涛安全地转移到担架上时，全身的衣服都湿透了，脸上的汗水不住地往下滴。就这样，一条在废墟中挣扎的生命得以安全救出，此时我们感到我们才是最幸福的人。

“可乐”男孩与最坚强的女孩

15日晚上，当我们营救出此次大震灾中的第九名幸存者后，忽然听见

在废墟的下又传来微弱的呼救声：“救救我，快救救我！”队员们立即向呼救的位置靠近，隔着有2米厚的废墟，我大声喊寻着：“是在这吗？能听到我说话吗？”废墟下一声有气无力的回应让我们知道这里确实有幸存者。我立即对该受困者说：“我现在已经确定你的位置了，请你不要说话，我马上救你。”施救从上往下凿破，是行不通的，很可能对受困者造成二次伤害，必须从一侧创建营救通道。

要想到达受困者的遇险位置，我们必须先清理出一条高50厘米，宽40厘米的营救通道，于是，通过救援队员们的双手，砖块在快速地清理，每清理大约50厘米，我们便立即做好支撑，以防废墟发生二次坍塌。营救通道只能容纳一名营救队员工作，且必须伏下身体作业，通过队员们的不懈努力，距受困者的位置越来越近，救援队员边清理边不住地给受困者鼓励：“快了，快到你的位置了。”当砖块清理完毕时，又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障碍——挡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倒地的铁皮柜，用手搬，根本搬不动。一队员在外边启动无齿锯，但效果不明显。连续不断地工作，队员的衣服已全部被汗水浸透。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攻克这个铁家伙，这样想着，我拿起一把无齿锯，低姿爬进该营救通道，顾不上自己的肉体与瓦砾摩擦的痛疼，爬到铁皮柜旁，用无齿锯艰难地在倒地的铁皮柜上锯出了一个高宽各大约50厘米的通道。

终于看见该受困者了，看着他满是灰尘的面庞和充满血丝的双眼，我



马晓凤、薛泉与救援队队员王念法



穿橙色救援服的唐山军人

雪地

有人说，汶川震灾救援中，用得最多的一个字是“挖”；但在四川平武县南坝镇，来自唐山消防支队的官兵们用了一个和30年前唐山救援同样的字——“扒”。那是一双双血肉的手捧出的爱

2008年的5月12日，历史将把这一天用沉重写入史册。

战斗在午夜打响

河北唐山。

2008年5月12日傍晚，汶川地震的消息还没有惊醒周一刚刚开始忙碌的人们，一条群发短信却已让每一位消防战士感受到肩上担子的分量。唐山消防支队以职业的敏感与责任，第一时间向全体官兵通报灾情，并动员官兵做好赴川救援的各项准备。

这是一个果断而及时的决定，官兵们跃跃欲试，休假的赶回了军营，伤病中的也收起了假条。养兵千日，用兵一时，每名官兵都懂得，在和平年代，急百姓之所急、解百姓之所需就是人民军队最重要的工作与责任。

一张张请战书递上去了，一份份学习文件传达了，抗震救灾领导小组成立了，警务、战训、组教、干部、财务、装备、法制宣传各部门，均一级待命！

13日晚，总队视频会议刚刚结束一个小时，一支由身穿橙色救援服的45名官兵组成并配有救援装备器材、运兵车辆、供给物资组成的赴川抢险救灾队伍已全部集结完毕。

就在救灾官兵准备开赴四川之时，以服务一线为重点的驻守官兵稳定工作也在有条不紊中展开了。唐山支队600多名官兵，灾区籍的就达到102名，稳定这些官兵的情绪，可以说是又一场硬仗。

按统一部署，支队10名机关干部组成的工作组，迅速深入到了11个基



抢险救援集结号紧急吹响

创造救生奇迹

徐德诗

什么是奇迹？在谭千秋、张米亚等老师们悲壮无畏的躯体下，保护了一名又一名学生的生命是奇迹；在已经逝去的父母翼护下与死神抗争40多小时，被救援队员抱出废墟的3岁女孩宋馨懿是奇迹；72小时“黄金救援时段”后救出被压埋和被困的幸存者更是奇迹。汶川大地震生命救援中，见证了诸多闪光的奇迹



汶川大地震虽然已成为昨天的记忆，但地震惨烈的灾难情景仍历历在目，悲壮感人、惊心动魄的抗震救灾难以忘怀。人们对汶川地震的反思一刻也没有停止过。汶川地震中公众（受灾和未受灾）的遭遇、表现、行动给全社会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由危急时刻唱响生命赞歌的幸存者和从废墟里托起生命的救援者共同完成的超越“黄金救援时段”的救生奇迹所激起的思索，尤为深刻。

一串闪光的奇迹

汶川大地震的灾难震撼世界，但在政府组织下的民族精神、公众力量创造的抗震救灾壮举更加感动世界。超越“黄金救援时段”的救生奇迹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汶川大地震造成4 625万人受灾、68 227人死亡，17 923人失踪。截至7月21日，解救和转移受灾民众1 483 445人，救出被压埋和被困的遇险者87 988人。专业紧急救援队伍救出被压埋和被困遇险者3 951人。据统计，72小时“黄金救援时段”后救出被压埋和被困人员事件52起，约60名幸存者（多数由专业紧急救援队伍完成）。每一起事件都是一个奇迹，都为每一个幸存者、救援者、现场人员以及从电视中看到、从广播中听到的社会公众留下了难以忘怀的印象。

汶川地震告诉我们：奇迹是“极难以做到的却做到了的事情”、“不

抢险救援
集结号紧急吹响



指挥着四川省的抗震救灾工作。根据四川省政府的指示安排，当晚7点钟省民政厅副厅长陈克福也赶到了都江堰“前线指挥部”，及时了解温总理和省委、省政府领导对抗震救灾的指示和要求，并即刻传达落实。

在越来越大的风雨中，在电和通信依旧没有畅通的情况下，温总理就在用彩条布搭的篷子里，率领指挥部在都江堰简易帐篷里就地开展工作。在一张四川地图前，温总理初步了解情况后，当即提出5点要求：一是部队要立即从南北两个方向向震中地区前进，要克服一切困难，就是步行也要尽快进入受灾最严重的地区，早一秒到达受灾地区，就可能早抢救更多生命；二是要争分夺秒抢修公路，哪怕修一条临时道路，也要把道路打通；三是要进一步摸清受灾情况；四是各部门要想尽一切办法将包括药品和食品在内的救灾物资运进灾区；五是地震部门抓紧会商，对地震趋势做出科学研判。

那之后，温总理又前往都江堰中医院和聚源镇中学察看灾情，慰问群众，悲痛地向遇难学生的遗体三鞠躬。

很快，兼任省慈善总会会长的张作哈副省长也赶到北川了。省长到达之后，他们即刻研究怎样更好落实胡锦涛总书记、温家宝总理的指示，尽快抢救伤员。抢救方案制定后，黄明全厅长与张作哈副省长一起赶赴北川中学。到达北川中学时，已经是次日的凌晨3点钟了。

张作哈，黄明全，一个是分管民政救灾的副省长，省慈善总会会长；一个是省民政厅厅长，省慈善总会常务副会长，尽管在过去的若干年内，他们都曾面对过许多灾难，面对过许多困境中艰难度日、急需救助的百姓，可北川中学废墟前的一幕，让他们太震惊了！从未有过的震惊，他们被震惊得目瞪口呆，整个人顿时懵了。

五层的教学楼坍塌得只剩下了破碎的一层，遇难学生的遗体，一片片横七竖八地横在眼前，凄惨的、捶凿着大地、撕碎着夜空的哭声令人肝肠寸断。救援人员、师生亲属、当地干部群众正不顾一切地抢救废墟下幸存的孩子。救援人员每抱出一个孩子，都会有一群人扑上去，他们是正找寻自己孩子的家长，寻找自己妻子的丈夫，寻找自己丈夫的妻子，每个人都像是要急疯了……

当时北川中学废墟前的抢救人员中，只有数量不多的武警、消防战士，且没有大型机械设备。张作哈、黄明全忍着悲痛，与满身泥土、满身汗水、雨水的市、县领导多方联络，紧急调运大型机械设备和专业救援人员，现场指挥着更大规模、更有成效的救援。

他们依旧惦记着震中汶川，他们要对大地震中所有灾区、所有的受灾



群众负责。张作哈副省长已经在考虑，如何落实总理的指示，尽快打通北川通往汶川的道路。黄明全厅长也在考虑怎样才能尽快摸清所有灾区的情况，怎样才能使所有受灾群众都能得到及时的救助。

.....

已经是13日的下午了，张作哈副省长决定继续留在北川，并连续坚守了最艰难的头5天。这5天里，他一直在一、二、三、四、五线，在最危险的地方指挥，他从来没有这样紧张、焦虑过，每说一句话都像是在吼，嗓子吼哑了，也全然不知。在张作哈副省长的安排下，黄明全厅长赶回成都，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全省的救灾工作，他要向省委、省政府汇报，要成立省民政厅抗震救灾指挥部，联系上所有重灾区，争分夺秒地组织好对灾区的救援。

他返回省民政厅的时候已经是13日的下午了。

这将近两天一夜的时间里，他只在颠簸的汽车里合了一会儿眼。眼睛是合上了，可眼前依旧是一片片倒塌的房屋，一个个死去的学生和悲痛欲绝的人们。他记不得吃了什么，好像吃了点面包，喝过几口矿泉水，可他并没有感到饥饿。

汶川是一定要去的，一定要尽快把帐篷、食品、衣被运过去！黄明全这样想。

都江堰、北川的灾情使他看到，受灾群众的房子倒塌了，没倒的也不能住了；粮食、衣物都被砸在废墟里了；有人不幸遇难了，更多的人还处在震情频发的危险环境里。黄明全清醒地告诉自己也告诉厅里的同志：在抢救受伤人员的同时，必须刻不容缓地把受灾群众转移到安全的地方，必须保证他们有地方住、有饭吃、有水喝。否则，就会有更大的损失。无论如何不能让这些遭难的群众再遭受新的伤害了！

同一时间内的成都

黄明全在都江堰、在北川的26个小时里，在通信偶尔畅通的时候，不时会接到省厅同志请示问题的电话。他也随时会根据灾区最前沿的情况，及时部署厅里的工作。

张力，一个大学教授出身的省民政厅副厅长，民主党派干部。省慈善总会的工作就是由他分管的。地震发生后的那次特别的厅长会议上，黄厅长安排他负责救灾物资的筹集、调运、分发。尽管那时他们还不很清楚灾区的实际情况，但他们都想到了灾区会需要大量的帐篷、食品、衣物。张力和厅里的几位同志一起清点储备仓库里的现有物资，当天天黑之前



区灾情的变化，做好救灾募捐的相关准备工作。

那时，还在天津的我，也一直轮番拨打四川省慈善总会秘书长杨秀华和办公室主任郭正二的电话。直到晚上将近9点的时候，才拨通了杨秀华的手机。地震发生时，在省党校学习的杨秀华正在赶回省慈善总会的路上。杨秀华感到了强烈的地震，也打听到一些灾情严重地区的情况，那时的他对灾情还没有更多更详细的了解。但作为省慈善会总会具体工作的实际负责人，他已经在考虑省慈善总会在这场抗震救灾工作中应该起的作用了。

这时，黄明全、三郎木滚深入灾区一线了解的情况，四川省民政厅了解到的灾区情况已经上报到民政部。李学举部长已经随温家宝总理到达都江堰指挥部，民政部已经把对灾情的二级响应提升为一级。范宝俊及时了解到这一情况，即刻与刘国林秘书长通电话部署抗震救灾工作，决定紧急向四川灾区拨付100万元救灾款和400顶帐篷，安排工作人员连夜起草募捐公告，并通告全国各省市团体会员。那一天一夜，中华慈善总会副秘书长、救灾救济部主任张心国一直在总会坚守，与民政部保持密切联系，接听热心群众打来的电话，执行总会领导的紧急指示。

民政部工作组抵达四川

地震发生的当晚，张力得知民政部四川灾区现场工作组正赶往他们这里并将赶赴灾区。这时，地震发生时正在泸州出差的副厅长杜小炎已经赶回省厅。张力将和杜小炎一起接待民政部来的领导，并想方设法把这一信息汇报给了在灾区现场指挥救援的黄明全厅长。

民政部四川灾区现场工作组的组长是救灾专员柳永法，一个责任心、使命感很强，多年辗转在全国发生灾难地区，在艰苦环境中从事救灾工作的同志。当时，北京到成都的航班已经停飞了，柳永法一行就乘坐了北京到重庆的航班，计划从重庆乘汽车赶往成都。他们所乘的飞机在重庆机场降落时，已经是13日零点三十分了。重庆市民政局已经根据民政部的要求，准备了去成都的汽车，并联系了警车开道。一下飞机，柳永法一边看手表，一边着急地催促大家即刻往成都赶：“马上就走！真的没有时间了，快走快走！”

汽车从重庆到成都，以往只要3个小时就可以到达，可当时的一切常规都被打乱了，虽然一路警笛长鸣，还是用了近5个小时才赶到四川省民政厅。这时，天已经快亮了。



是各式各样、五花八门，大的可以供十几个人、几十个人使用，能当教室、图书室。小的，像那种个人旅行的帐篷只能装下一两个人……”张力继续说。

我听后，也被点亮了，在都江堰、北川、青川、映秀、绵竹、什邡、平武等极重灾区的许多地方，我其实也注意到那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式样、颜色也不同的帐篷，注意到它们不同的风格、特点。曾经在灾区见到的那些帐篷景象好像一下子又涌到我的眼前……

大约在“5·12”之后的第三天，我曾在北川拍摄了一张题为“救”的照片，照片的左边是帐篷的一部分，那簇新的深蓝色的帐篷上有一个醒目的“救”字，照片的右边则是地震的废墟和一辆有我国公安标志的汽车。地震发生后最初的几天里，我在灾区看到的帐篷，多数都是这种标有“中国民政”、“救灾”字样、深蓝色的帐篷。听张力副厅长介绍说，地震发生时，他们从剧烈摇晃的办公楼跑到前面的院子里，打探到地震方位后，厅长黄明全就站在院子里和副厅长们研究、部署抗震救灾的问题。他们都想到了灾区会需要帐篷，即刻责成有关同志清点库房里存放的救灾帐篷等救灾物资。而后，黄厅长与分管副厅长即刻奔赴地震中心实地考察灾情。从灾区回来后，黄厅长又亲自押运装载这些帐篷的车队开往汶川方向。那时，天还下着大雨，余震也不断地发生着。地震中心的灾民太需要这些帐篷了。紧接着，标有红十字和慈善字样来自中国民间慈善救援组织



汶川的军用帐篷



坏了，为此还和老板干了一仗。虽然有了这个不愉快的经历，可小伙子还是坚信世界上好人更多，帮助灾区人民的热情一点儿也没有减退，并最终托朋友买来一顶不错的帐篷，及时给灾区送去了。

我们都清楚地记得，2008年5月22日上午，胡锦涛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议，专门研究继续全力做好抗震救灾工作。会议一结束，胡锦涛便即刻赶赴浙江省湖州市，深入到生产帐篷的工厂、车间，实地考察救灾帐篷生产情况，慰问、鼓励生产一线的职工，并提出具体要求，要求尽快生产出高质量的救灾帐篷，并及时运往灾区。长时间在灾区一线的国务院总理温家宝那时说的话我们也不会忘记：“在解决受灾群众的衣食住行方面，最困难的是住，也就是说缺少帐篷。这次地震灾害倒塌和损毁的房屋达到1 500万间，大量的灾民需要安置，我们已经调集了全国的帐篷，而且得到了国际社会的支持，但是帐篷仍然缺乏，中国政府要求能够生产帐篷的工厂每天生产和向灾区运输3万顶帐篷，一个月内运送90万顶，同时抓紧制作活动板房，争取用3个月时间把灾区安排有序，使灾民过上正常的生活。”

我们党和政府对灾区群众这种无微不至的关心，无疑带动民间的慈善援助，这种援助有国内的，也有国外的。中华慈善总会设在四川省慈善总会的一线工作组的物资保障办公室，那时接收、发放的物资中，许多都是帐篷。

2008年5月23日太阳已经下岗休息的傍晚，我从灾区一线赶回省慈善总会办公大厅，看见英国扶轮社一行5人正和总会封如钟同志商谈向重灾区捐赠救灾帐篷的事情。他们带来了介绍帐篷性能和搭建方法的带图片的文字资料。这些从英国运来的帐篷不同于我们普通的帐篷，有的帐篷就像单元套房一样，除一个大的空间外，还有几个小一些的空间，可供一家几代人临时安身。折叠好的帐篷都装在单个的大塑料箱里，那里面除有一顶帐篷外，还有炊具、餐具、电筒、雨衣等一些适于野



中华慈善总会在绵竹的帐篷

外生活的必需品，就像是一个灾难中的庇护小屋。他们说，这些帐篷特别适合用在山区，所以希望能送到受灾的山区，那里的百姓困难相对也会更大一些。老封，还有四川省慈善总会的同志顾不上吃晚饭，一直和他们商议如何尽快把这批帐篷送到最重的灾区，灾民最需要的地方，直到捐赠者认可为止。

我注意到这批帐篷很快就被送到了青川。青川是典型的山区，全县73.8%面积坡度大于或等于 25° ，山脊此起彼伏，绵延不断。3 000米以上山峰有8座，2 000~3 000米的有50多座。最高海拔3 837米，最低海拔491米。我曾多次到过那里，地震前那里的风光是十分秀美的，郁郁葱葱的青山直拔入云，波光粼粼的河谷曲折深幽。汶川地震使青川遭到了极大的破坏，灾情十分惨烈。全县80%的房屋倒塌，未倒塌的也大多严重受损，无法再居住。全县幸存的25万灾民全部宿在野外、田间地头，甚至就在山路边上。当时，帐篷是那里特别急需的救灾物资。6月6日，我和老封、郭正二主任轮流驾车到青川考察救灾物资发放、使用情况，其中就有考察英国扶轮社通过中华慈善总会和四川省慈善总会发放到那里的帐篷的使用情况的任务。考察中我们发现，这批帐篷在那里发挥了很好的作用。多山的青川开阔的平地本来就很少，地震后可以安身的平整土地就更少了，所以这些适合在山区搭建的帐篷在那里很受群众欢迎。当然，这批帐篷只是当时青川帐篷的一小部分，那里的帐篷同样来自四面八方。除了我国政府和我国百姓通过慈善组织捐赠的，我们还看到了联合国救援机构捐助的白色的像管道一样的帐篷，看到了李兆基基金、恒基集团捐赠的蓝色帐篷，看到了天津市红十字会捐赠的灰色帐篷，还看到了旅游爱好者捐赠的旅游帐篷。



映秀镇政府办公室兼卧室的帐篷

有简单的帐篷，也有很讲究的，像单元房那样，两室一厅、三室一厅的。带门厅的也不少。

汶川地震发生后，中华慈善总会不仅及时调拨自己的库存帐篷运